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文丛·重大项目

# 中国新文学家与现代文化建设

中卷

吴义勤 主编



山东教育出版社

中国语言文学类课程思政教学案例选编（第二辑）

# 中国语言文学类课程思政教学案例选编

第二辑

中国文联出版社



（京）新登字01号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文丛·重大项目

# 中国新文学家与现代文化建设

中卷

吴义勤 主编

山东教育出版社



# 目 录

- 边城文化的守望者——沈从文与现代文化建设/王明科 /365**
- 一、文化视野中被误解的沈从文 /365
  - 二、沈从文对传统文化的反抗 /374
  - 三、沈从文对现代文化的反思 /383
  - 四、爱与美：沈从文文化建构的理想内涵 /389
  - 五、沈从文文化体验的悖论性 /395
  - 结 语 沈从文文化体验的价值与局限 /407
- 城市底层叙述的文化自觉——老舍与现代文化建设/张丽军 /412**
- 一、“城市底层叙述”，现代文学的独特文化景观 /412
  - 二、老舍城市底层叙述的多元文化维度 /417
  - 三、“为穷人”创作的文化自觉和文学实践 /436
  - 结 语 /456
- 文化的现代性与通俗性——徐许与现代文化建设/吴义勤 张 青 /459**
- 一、徐许的浪漫主义文化选择 /460
  - 二、徐许文艺思想的现代性 /474
  - 三、多元开放的文化观与拿来主义的文化立场 /486
  - 四、徐许的当代意义 /496
  - 结 语 /503
- 市民文化的现代意味——张恨水与现代文化建设/温奉桥 /505**
- 一、张恨水与中国文化现代化 /505
  - 二、张恨水与现代市民文化 /513
  - 三、张恨水小说的文化策略与文本形态 /530
  - 四、张恨水与章回小说的现代性 /548
- 整合与超越——无名氏与现代文化建设/王寰鹏 /569**
- 一、无名氏：一个现代文化的超越者 /569

二、孤独的“智性人”：无名氏的文化选择 /576

三、艺术表现生命：美学现代性视野下的无名氏 /592

四、文化的整合与超越：无名氏的文化意义 /606

**现代文化的多维涵蕴——汪曾祺与现代文化建设/翟文斌 /608**

一、守望传统文化的精髓 /609

二、汪曾祺与民间文化 /633

三、汪曾祺与“五四”文化 /643

四、汪曾祺与西方现代文化 /652



# 边城文化的守望者

——沈从文与现代文化建设

王明科

## 一、文化视野中被误解的沈从文

多年来,由于各种原因导致了对沈从文的创作缺乏一种全面把握及文本细读,许多人用我注六经的先验方法武断地阐释沈从文。传统研究的习惯与思维定势大大遮蔽与歪曲了沈从文创作的真实全貌,导致了許多不同层次不同学习者甚至研究者对沈从文的诸多误解。倘若我们借用西方新批评的某种方法,以沈从文的所有创作文本为依据,通过“细读”尤其对“细节”与“碎片”的重视,努力试图将传统研究中已经丧失的有意义的细节、没有进入视界的琐屑、被遗忘的因素、被遮蔽的思想等重新关注,那么我们就可以求得对沈从文的创作获得一种全新的人性经验、审美体验、思想洞穿。

可以说,出于某种程度上的非学术与非个性因素,中国现代文化特别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沈从文,一直处于某种被压抑与被边缘化的境地。在20世纪30年代与40年代那个充满枪炮弹药与血光剑影的历史语境里,沈从文的写作由于在一定意义上被认为“不合时宜”而备受冷遇,因此而留下的后遗症是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之间出现的作家搁笔与转行。当他奉总理之命去研究中国古代官僚服饰时,作为学者的沈从文不但学有所长<sup>①</sup>,同时也仍然没有忘记他在骨子里的作为作家的对于文化再造与文学创作的极大热情——虽然这种热情是小心翼翼的,是有着很大空间限制的,是不得不有意识地进行自我掩饰的,这在沈从文于20世纪

<sup>①</sup> 在《从新文学转到历史文物》一文里,当有人问沈从文“您最近出版的第一部大作,可在什么地方买到”时,沈从文回答:“最近在香港印行的是有关服饰的,这部稿子在文革期间几乎被烧掉。书名是《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是当时周恩来总理给我的一个任务,在一九六四年就完成了。有二十多万字说明,四百多张图片,从商朝到清初,前后有三千多年。不久将来或许将有英、日译文本了。但里面应用的材料可能太深了点,不大好懂,在翻译中将有些删减。我倒希望有些版本能不删减,可作为研究资料用,许多问题还有待讨论。”《沈从文文集》第10卷,花城出版社1984年版,第338页。

80年代的文化界复出后的一系列文章中表现得特别明显,比如1980年11月7日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演讲与1980年11月24日在美国圣若望大学的讲演。

直到20世纪80年代特别是作家逝世以后,中国学术界与文化界才开始真正地想走进沈从文的世界,于是出现了一段时间的“沈从文热”。笔者认为,当有价值的主体在这个世界上还能够面对面地对话的时候,当他们鲜活的生命能够随时迸发出思想的火花与生活的热情的的时候,当他的声音依然还能够对命运作出极大反抗的时候,世界与人们对他们却抱了许多的冷漠与严厉的苛求,这样的冷漠与苛求只有等到主体的肉身死灭之后,才能够得到彻底纠正与“平反”,中国古语有言:“盖棺定论!”时至今日,一个中国人特别是一个中国的学者与作家,不“盖棺”是很难定论的,甚至不“盖棺”是很难得到客观公正的定论的。我认为,这不仅是中国作家的悲剧,更是中国文化的悲哀——而中国人向来是有着某种看客意识与偷窥欲望的,在这个有价值的主体对他们的存在已经不会构成某种竞争甚至威胁时,他们往往才能够将这种反常的偷窥转变为正常的关注。这个现象是比较普遍的,也是每一个中国文化语境下的人都能够而且很容易理解的,同时也是构成各种中国文化热的成因之一。

因此,作为研究历史,我们完全可以将以前那种不正常的不平等的没有多大合理性标准下的各种观点作出梳理,但是同时我认为,将那些观点视为权威经典甚至被迫屈从与盲目服从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将那些观点作为我们研究的论证基础与论据准则更是没有多少价值的。在我看来,如果有意义,那也是作为研究历史而存在的意义;如果有价值,那也是作为一种警惕而启迪的价值。所以,本文的重心不在于探讨那些观点的是非曲直与优劣利弊,而是将主要眼光投注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人们特别是中国学术界与文化界能够以比较正常的具有某种真正学术与文化性质的研究,梳理这些研究观点,并同时总结研究中的许多现象,从而试图对作家的全人全文有所全新的解读——我认为,这对于我们打开走向作家文本理解的新的神秘的暗门是很有必要与意思的。

作家的创作文本作为一种客观性存在,是一个具有极大丰富性的存在,而研究主体本身作为一种主观性的存在,更是具有极大的创造性与个性的存在。所以,我们不可能将所有研究者的所有观点都一一作出展览与评判。事实上,就一个具体的研究者本人来说,他的观点也并不是始终僵死不变化的,而是一直处于流动变迁中的。我认为,世界是不断变化的,人也是随着时间与空间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对象在不同时空下显示着不同的意义,思想在不同的对象面前表现出不同的取舍,只有永远变化的变化,没有永恒不变的不变。作为研究,我们应该抓住某种具有现象意义的代表性观点,并在各种比较普遍的代表性观点的比较分析中找出研究问题与探求线索,而在这些代表性观点中,最值得挖掘的不是一些普遍被大家接受的流行观点,而是在所谓流行观点中存在的种种误读与误解。纵观20世纪90年代以

前的沈从文研究,可以说,其间存在的比较有代表性的误读观点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种比较普遍被大家接受的流行观点认为:沈从文不关心时代与社会,对中国革命的发展缺乏关注,不具有主流作家的品质。持这种观点的人很多,在此我们不想将他们的原文一一引用。笔者认为,其实,沈从文深刻的文化反省直接涉及到了中国现代文化的整个困惑,其全部写作实际上已经直接继承了中国新文学的主题,其文化反思与以国家再造社会重建为主题的启蒙主义理想直接相关。我们只要从作家的文本重读本身出发,就会发现沈从文的社会关注与文化启蒙思想在他的创作中占着很大的比重。

比如,沈从文对中国制度文化的反思就是很明显的:小说《入伍后》直接宣布“在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下弄成的一切权威”才是人们真正的“敌人”!<sup>①</sup> 小说《若墨医生》对中国的社会制度结构作了总体反思。在小说《阿丽思中国游记》与作家的其他序跋或散文中,沈从文对中国的社会制度结构又作了具体的分别反思。在沈从文看来,只有对各种不合理制度的彻底变革,才会使中国社会不断地走向现代化。从而,“不再有求神保佑的作官人,不再有被随意杀头的学生,不再有把奴隶论斤转卖的行市,不再有类乎赌博的战争,不再有苍蝇同臭虫。”<sup>②</sup>可见,沈从文不是不关心现实社会中血与火的残酷,只是他对现实生活关怀的方式与众不同。他认为讽刺露骨是一种浅薄,于是他“真想过另外起头来补救的”办法是“把深一点的社会沉痛情形,融化到一种纯天真滑稽里”。<sup>③</sup> 在沈从文看来,“讽刺与诙谐,使许多作品用小丑神气存在”,他称这种文学态度为“白相文学态度”,认为有必要“以文学附丽于‘生存斗争’和‘民族意识’上,使创作摆脱了肤浅的讽刺,拘束到‘不儿戏’情形中”。<sup>④</sup>

与当时的许多作家直接写出革命加恋爱的小说甚至声嘶力竭地高呼革命口号不同,沈从文将自己对国家民族的关注以及革命前途的忧虑,以另一种更为根本更为冷静的方式表达着,其目光在一定意义上超越了几乎成为当时文化与文学分析模式与成规的阶级观念与狭隘的党派之争,而是致力于从民族与国家的根本制度上作最根本的剖析,这种剖析的深刻之处在于不拘于具体的人与事情,不纠缠于具体的阶级斗争与党派利益,而是从全民族振兴的根本出路与全国家富强的高度眼光来考虑,其深思完全符合一个文化人的身份,并从文化的视角以文化的方式得到适宜的表达。由此看来,当初批判沈从文的那些人,其实是暴露了自己对于文化的无知与盲目。一个文化人首先要从文化的判断开始,他没有必要去高喊革命口号,除非他去做一个革命者;他也没有必要去进行具体的党派政治活动,除非他去做一

① 沈从文:《沈从文文集》第2卷,花城出版社1982年版,第365页。

② 沈从文:《沈从文文集》第1卷,花城出版社1982年版,第383页。

③ 沈从文:《沈从文文集》第1卷,花城出版社1982年版,第203页。

④ 沈从文:《沈从文文集》第11卷,花城出版社1984年版,第13~14页。



个政治家；他也没有必要去鼓动人们拿着刀与枪冲锋陷阵，除非他去做一个军事家。所以，沈从文对于国家民族以及时代的关怀，对于他作为一个作家来说，其方式其角度都是应该这样的，而不是那些批判者所批判的应该那样的。我们今天完全可以作出另一种评判：当初批判沈从文的那些人所持的观点与标准是不合适的，相反他们所批评的沈从文的所作所为在很大程度上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恰恰却是具有很大的合理性。

另一种比较普遍的流行观点认为：沈从文在血与火的年代将目光投向传统乡村文化，对中国国民素质的现代化毫无关怀，甚至将乡野文化性格作为一种追求。与前一种观点相比较，这种观点已经具有很大的学术意义与研究价值，因为它将我们的文本研究已经纳入到学术视野而不是徘徊于政治与阶级的旋涡里，但学术的进步性同时也即学术的局限性，真理往往只是相对的真理，是局限于某种时间与空间范围内的真理，随着真理的探讨深入化，旧“真理”终将会被新“真理”所替代。笔者认为，其实沈从文对中国社会与文化的反思不仅表现在制度的现代化方面，也体现在从精神层面的现代化方面对中国国民精神进行了深刻反思与极大关怀，他并没有将传统乡野文化看作一种至高无上的理想文化，更没有将中国文化打算倒退到这种文化的原始境遇中去。

在小说《若墨医生》中，“我”与若墨大夫的意见有所不同，若墨大夫的文化拯救主要在于制度文化的变革上，而“我”的文化拯救主要在于心理、意识、信仰等精神文化的变革上。《阿丽思中国游记》中通过哈卜君与雉喜及阿丽思等人的言谈与心理，沈从文一一列出中国文化在精神层面的各种表现。其实，纵观沈从文的全部创作，他对中华民族集体无意识深处根深蒂固的守旧惰性心理的揭示，贯穿了其整个创作过程。小说《阿丽思中国游记》中通过仪彬二哥给阿丽思的信，指出中国人固守传统、循规蹈矩的守旧文化心理。小说《龙朱》与《凤子》里以同样的文字继续了对保守文化心理的批判：“民族旧积习，折磨了天才与英雄，不是在事业上粉身碎骨，便是在爱情上退位落伍。”<sup>①</sup>散文《谈保守》里沈从文专门比较了中英两国不同的保守心理后指出：由于一切进步包含一种由不合理转为合理的变革，社会若进步，凡在保守中用不正当方式取得者与规避者如贪污、门阀等即不免失去其保障。因此“进步”便为多数人惶恐与厌恶。这些人惧怕进步，生存态度极端妨碍进步，因之诅咒它，诋毁它，盲目耗费力量极多。倘若把这点抵制进步的力量转移到相反方面去，中国便不会像当前情形了。沈从文看到：在这样的文化语境里，顽固保守家经过一度化装，在新的社会组织里又成为中坚，他们对于任何进步理想都难于适应而感到惶恐甚至仇视进步。由于这种民族深层的文化心理，中国社会至今还充满了鬼神迷信，大多数读书人还在圆光、算命、念佛、打坐、求神、许愿种种老玩意儿中过

<sup>①</sup> 沈从文：《沈从文文集》第2卷，花城出版社1982年版，第17页。

日子。大多数人都习惯将生命交给不可知的运与数，或在贿赂阿谀交换中支持他的地位，发展他的事业。统治者为便于治理，中产者为便于维持，薪水阶级为便于生活，守旧与惧怕变革成为当然趋势。因为社会上这类人占有相当多数，所以一切使民族向上的言词，都失去良好反应，不是变得毫无意义，就是变得非常可怕。一切使国家进步的事实，都认为不足重视。整个社会在这种“混下去”的情形下听其自然推迁，不但个人事情甚至国家民族问题也同样付之命运。这尤如鲁迅所说，在中国，搬一张桌子也要流血。

尽管沈从文文化反思的范围非常广泛，涉及中国的茶、画、饭菜、古版书、政治、革命、司法、军事、土匪、行政、教育、写作、乡村、城市、男人、女人、心理、性格、信仰、追求、习惯、礼貌、风俗等包括器物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的各个方面，但就是在这非常广泛的文化反思的各个方面，沈从文对民族国家及现实社会尤其对国民劣根性的关注并不弱于革命文学作家与启蒙文化专家，只是他的关注更是一种个人的独特的更具有文化意蕴的表达方式，这就是沈从文所说的“把文学当成一种个人特写，不拘于主义，时代，与事物论理的东西”。<sup>①</sup>正是真正地从文化的意义上剖析中国社会与国家民族，沈从文进而提出要“重新来检讨影响到这个民族正当发展的一切抽象原则，以及目前还在运用它作工具的思想家或统治者，被它所囚缚的知识分子和普通群众”。<sup>②</sup>可见，沈从文并不是不关心中国文化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他非但没有将传统乡野文化视为完美的文化理想与中国文化的至上，相反是真正地看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极大弊端与保守封闭，并且能够从剖析中挖掘出其中带有普遍性与本源性的国民劣根性与传统文化弊端，同时将这种传统文化的腐朽之处与陷阱之处与中国当时的黑暗现实与悲惨现状结合起来。

倘若我们将目光投注到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沈从文研究，我们可以发现研究者所持的视角越来越新颖，一个极大的进步是脱尽了先前的政治话语与阶级话语而投身于沈从文创作文本所显示与深藏的巨大的文化价值与审美意义，这使我们的学术研究真正地开始进入学术的视野，同时使我们的学术争鸣也进入正规的与正常的学术领域——而不再是以前的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那种将文化论争与学术争鸣动不动上升到意识形态领域或者政治革命与阶级斗争的险恶争斗与狠毒怪圈里。（倘若是那样，文化就将变成沙漠，学术就将成为空白，思想就将逐渐死亡！）同时，这个时期的沈从文研究，令人欣喜与值得肯定的是能够尽力破除流俗思想与方法的拘囿限制，借鉴西方的一些新学说新方法如：现象学、阐释学、接受学、陌生化、新批评、生命知觉、社会批判、表现主义、存在主义、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女权主义、后现代主义、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等，新的研究

<sup>①</sup> 沈从文：《沈从文文集》第1卷，花城出版社1982年版，第344页。

<sup>②</sup> 沈从文：《沈从文文集》第1卷，花城出版社1982年版，第111页。

框架与思维方法带来了研究的丰富与正常的争鸣——多元共存、各执一理，成为研究界的“美满”现状。但是同时，可以说，在这种真正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中，其间也存在着比较明显也比较有代表性的误读观点，当然这肯定也是在学术层面上说的，所针对的仍然是学术的观点而不是具体的人，是对事不对人，所以，笔者也就没有必要将持这些观点的所有学人一一列举出来。

我认为，对沈从文最大也最严重的误解在于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对其城乡文化反思的误读中。及时矫正这种误解直接关系到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重写与中国现代文化的重建。简而言之，20世纪90年代以后对沈从文的城乡文化反思的误读主要有两种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沈从文在一种浪漫与诗意的追求中赞美与美化了传统乡村文化。我认为，其实沈从文非但没有美化乡村文化，而且主动积极地以城市文化之优去观照乡村文化之弊，发现了并列举和剖析批判了乡村文化的种种愚昧麻木。比如在小说《阿丽思中国游记》的第二卷中，阿丽思到了中国乡下，发现穷人听天安命，愤懑或者病了的时候不是找相关的人或者医生来解决，而是走向庙宇神殿向神申诉，乡村文化下的人们最愿意也最容易产生拜物思想，他们对于邪恶不是大力与合力抵制，而是相反出于一种盲目的与莫名的力量来敬畏善于说谎的人、装痴的人、赌咒的人、杀人的人。小说《丈夫》中不亟于生养孩子的黄庄妇人，其文化背景是地地道道的传统乡村文化，作为一个真正的乡下女人，她并不是淳朴敦厚的传统女性，而是一个非传统的不守妇道的有着自己个性的大胆举动的女人。不管她的这种举动的文化意义是传统文化的变态还是现代文化的畸形（在此我们可以先不去讨论这个论题），也无论她的这种举动的现实意义是为了生存还是为了堕落，但实际上她的行为本身是跑到了城市做那种肉体交易的生意，每月把两个晚上所得的钱送给那留在乡下诚实耐劳以种田为生的丈夫——笔者认为，这种行为本身就是作家反映出的传统乡村文化的愚昧，因为她毕竟有丈夫，毕竟有自己的田地，也没有必要去做这种交易，因为她实际上远未被生活与生存逼迫到那一步！小说《建设》中做工的乡下人也不是淳朴敦厚，而是些近于无用的人，除了天生的牛马气力之外什么事也不能做。在小说《知识》里，令人震惊的一幕是：一位农家儿子被蛇咬死了，但主人却不但伤心反而这样说：“我伤什么心？天旱地涝我们就得饿死，军队下乡土匪过境我们又得磨死。好容易活下来！死了不是完了？”<sup>①</sup>这一方面完全可以理解作为一种愤激之词以及对现实黑暗社会的变相鞭挞与反向诅咒，但另一方面也充分反映出了作为乡野人的愚昧麻木——他为什么不进行积极反抗而要消极反抗甚至自虐与自杀？自虐与自杀永远是愚昧与弱者的举动而不是智者与强者的举动！而当我们读到《我的教育》一文的时候，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乡村文化的愚昧

<sup>①</sup> 沈从文：《沈从文文集》第6卷，花城出版社1983年版，第292页。

落后,同时还有夹杂其中的原始野蛮与兽性恐怖,比如乡下人在杀人后却全都像是过节,酒醉肉饱,其乐无涯。

可见,沈从文并没有美化传统乡村文化,而且相反在关注与回眸乡村文化的同时写出了乡村文化的很大弊端。沈从文的深刻与复杂是在写出乡村文化令人羡慕一面的同时也暴露了其许多的痼疾与糟粕,在和谐的天人合一、其乐融融的氛围中始终透露出其中的不和谐与不快乐。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沈从文企图以传统乡村文化抗拒现代城市文化。而我认为,其实沈从文非但没有抗拒现代城市文化,反而看到了现代城市文化替代传统乡村文化的不可阻挡的必然趋势甚至是既成事实。沈从文的文化视野,既不是简单的传统乡村文化视野,也不是简单的现代城市文化视野,而是始终处于一种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的优劣利弊的比较文化视野中。在这种彼此冲突又相互融合的二元文化力量的不断冲撞与回旋中,沈从文发现城乡文化之间冲突的结果是乡村文化的和谐淳朴与安宁敦厚在城市文化的进攻下走向灭亡与堕落的不可避免。

小说《一个女剧员的生活》中女主角萝向大学生密司特讲到了“从旧的时代由于一切乡村城镇制度道德培养长大的灵魂,拿来混到大都市中去与新的生活作战”<sup>①</sup>的苦闷!而城乡文化冲突的一个令人震惊的事件是《知识》中哲学硕士张六吉毕业以后回到家乡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写信给他那博学多闻的导师:“老骗子,你应当死了……你是个法律承认的骗子,所知道的全是活人不用知道的,人必需知道的你却一点不知道!”<sup>②</sup>于是他把所有书籍全部烧掉。而在作家的著名长篇小说《长河》的前言里,沈从文则直接写出了城市文化取代乡村文化的必然趋势与既成事实。他看到,湘西的“农村社会所保有的那点正直素朴的人情美,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代替而来的却是……一种唯实唯利庸俗人生观。敬鬼神畏天命的迷信固然已经被常识所摧毁,然而做人时的义利取舍是非辨别也随同泯没了”。<sup>③</sup>在沈从文看来,湘西世界作为中国传统乡村文化的一个切片与代表,所表现出来的是这样的一种景观:长者的体力已经衰竭,他们的感情已经凝固,即使他们尚能够留一些治事做人的优美崇高风度,但却显示出明显的极大的保守性。而青年尤其是公子哥儿们,则显得有钱而无知,只能给人造成一种痛苦的印象。

正是由于沈从文认识到了这种城市文化替代乡村文化的无法挽回,所以他也带着痛苦的心情,用辰河流域的水码头作为背景,就自己所熟悉的人与事来写平凡人物的常与变以及两相乘除中的所有哀乐,为避免给读者一个痛苦的印象,作家特别申明自己的写作还“特意加上一点牧歌的谐趣,取得人事上的调和”。<sup>④</sup>于是我们

① 沈从文:《沈从文文集》第3卷,花城出版社1982年版,第393页。

② 沈从文:《沈从文文集》第6卷,花城出版社1983年版,第297页。

③ 沈从文:《沈从文文集》第7卷,花城出版社1983年版,第2页。

④ 沈从文:《沈从文文集》第7卷,花城出版社1983年版,第5页。



看到,小说《小砦》所反映出的西水流域中部的商业和道德都在不断地崩溃,沈从文感叹道:“中国农民固有的朴厚、刚直、守正义,不贪取非分所得种种品德,已一扫而光。代替这种性格而来的特点是虚伪与油滑。虚伪以对上,就成为巧佞和面谀。貌作恭顺虔敬,其实无事不敷衍做作,毫不认真。油滑以驭下,则成为无数以利分合的小团体竞争,各取所需,各得其所。”<sup>①</sup>甚至,沈从文进一步以乡村文化之优观照城市文化之弊,发现城市文化的堕落变态:《第四》中城市男子们多是阉寺的性本能的缺乏,多凭空的怀疑、嫉妒、不知羞耻。《如蕤》指出:“都市中所流行的,只是为小小利益而出的造谣中伤,与为稍大利益而出的暗杀诱捕。恋爱则只是一群阉鸡似的男子,各处扮演着丑角喜剧。”<sup>②</sup>《八骏图》题记中沈从文说大多数读书人“十分懒惰,拘谨,小气,又全都是营养不良,睡眠不足,生殖力不足”。<sup>③</sup>沈从文发现读书界有一种明显的现象是“倦于思索、怯于怀疑、苟安于现状的种种,加上一点为贤内助谋出路的打算,如何即形成一种阿谀不自重风气”。<sup>④</sup>

需要着重指出的是:沈从文尽管确实是看到了城市文化替代乡村文化的必然趋势与残酷现实,但同时,沈从文的深刻恰恰就在于他并没有在这个问题上持一种简单的进化论的态度——他并没有因为城市文化必然要逐渐取代乡村文化而认为城市文化就一定要比乡村文化优越甚至先进得多!相反,沈从文认为“城市中人……虽俨然事事神经异常尖锐敏感,其实除了性欲意识和个人得失以外,别的感觉官能都有点麻木不仁”。<sup>⑤</sup>他发现虽然现代的文化已经浸染到了湘西,“可是具体的东西,不过是点缀都市文明的奢侈品大量输入,上等纸烟和各样罐头在各阶层间作广泛的消费。抽象的东西,竟只有流行政治中的公文八股和交际世故”。<sup>⑥</sup>在沈从文看来,这种所谓的“现代”观念普遍存在并且适用到一切人与事上,实际上则反映出了中国社会与中华民族的堕落,所以,他呼吁:憎恶这种近于被阉割过的寺宦观念,应当是每个有血性的青年人的感觉。在《篱下集》的题记中,沈从文指出:“怕事,偷懒,不结实,缺少相当主见,凡事投机取巧媚世悦俗……这种‘城里人’仿佛细腻,其实庸俗;仿佛和平,其实阴险;仿佛清高,其实鬼祟。”<sup>⑦</sup>在此,笔者需要强调的是,所有这一切论说,不是反映了沈从文对现代城市文化的抗拒,而是表现出作家对于城市文化弊端的拯救企图——他之所以批判乡村文化的愚昧就是承认了城市文化的合法,他之所以回顾乡村文化是要以乡村文化之优弥补城市文化之弊,他之所以诅咒城市文化是由于城市文化在带来现代化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异化与陷阱。

① 沈从文:《沈从文文集》第11卷,花城出版社1984年版,第239页。

② 沈从文:《沈从文文集》第5卷,花城出版社1982年版,第262页。

③ 沈从文:《沈从文文集》第6卷,花城出版社1983年版,第166页。

④ 沈从文:《沈从文文集》第10卷,花城出版社1984年版,第110页。

⑤ 沈从文:《沈从文文集》第11卷,花城出版社1984年版,第44页。

⑥ 沈从文:《沈从文文集》第7卷,花城出版社1983年版,第2页。

⑦ 沈从文:《沈从文文集》第11卷,花城出版社1984年版,第33页。

综上所述,沈从文并没有坚守与美化乡村文化,也没有抗拒现代城市文化。他既没有美化乡村文化也没有美化城市文化,而只是在城乡文化的互相对比中打破一种二元对立模式,从而在一种整体结构上去观照乡村文化及城市文化各自的优劣利弊。沈从文不但十分清楚乡村文化如前所述的种种愚昧落后,同时也看到了乡村文化的淳朴敦厚等值得保留的美好特质在城市文化的涌动中渐渐地丧失殆尽,因此,他以“希腊小庙”里供奉的人性为度,去感受那城里的乡下人与乡下的城里人所独具的生存难堪。

沈从文的伟大,不在于他对于乡村文化的坚守与美化,也不在于他对现代城市文化的抗拒,而在于他一方面能够用城市文化的先进反观到乡村文化的落后,另一方面试图以乡村文化之优来补充与疗救城市文化的变态与畸形。在中国文化现代化的整体追求中,沈从文特别清醒地意识到了现代性的内在悖论性,对城市文化的批判只是反映了沈从文反抗现代性的文化追求,并不会必然推导出沈从文因此要以传统乡村文化来抵制现代城市文化。由于对现代工业文明弊端的反思性批判,使沈从文具有了一种回瞥的眼光,但这仅仅是一种回瞥,而并不是倒退——回瞥与倒退确实是有着很大的甚至根本的不同。当中国尚处于经济很不发达的前现代社会时,当国人大力致力于现代化的呐喊时,沈从文就看到了现代化的负面作用,看到了现代性作为一把双刃剑的复杂内涵,并以他独有的回瞥眼光提醒人们应该注意到现代性给中国社会与中国文化所带来的所有困惑与极大反思,其重大价值与意义并不在于启迪人们对现代城市文化的排斥与抗拒,而在于提醒人们在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初始阶段就开始注意到西方社会在经历了几百年现代化而进入后现代时发现的种种现代性弊端。

在沈从文看来,传统乡村文化与现代城市文化都是既有利又有弊的,所以他创造性地提出以“爱与美”为文化建构的立足点,企图重构一种超越乡村文化与城市文化的理想文化,认为“文化的向上也就是追求善或美的一种象征”,“因为我活到这世界里有所爱。美丽,清洁,智慧,以及对全人类幸福的幻影,皆永远觉得是一种德性,也因此永远使我对它崇拜和倾心。这点情绪同宗教情绪完全一样”。<sup>①</sup>而沈从文为了保证这种宗教意义上的“爱与美”的文化建构,他必须有一个文化建构的立足点与基本立场,为此,沈从文选择了穷人与乡下人的立场,他说:“我实在是个乡下人。说乡下人我毫无骄傲,也不在自贬。”<sup>②</sup>从这个基本立场出发,沈从文“培养爱与合作种子使之生根发芽,企图实现在人与人间建设一种崭新的关系”,<sup>③</sup>其实就是企图重新建立中国现代文化格局中的城乡文化关系:不是城乡的差别越来越大甚至不可沟通,而是在相互交流、相互撞击与相互借鉴、相互渗透中形成中国现代

① 沈从文:《沈从文文集》第11卷,花城出版社1984年版,第4页,第8页,第34页。

② 沈从文:《沈从文文集》第11卷,花城出版社1984年版,第43页。

③ 沈从文:《沈从文文集》第10卷,花城出版社1984年版,第161页。

文化的良好重建。

可见,沈从文的城乡文化反思既没有完全以乡村文化为标准也没有完全以城市文化为标准,他只是在城乡文化的互相对比中去观照乡村文化及城市文化各自的优劣利弊,从而求得一种文化的再造与重建。沈从文既追求中国文化现代化也质疑现代性,既回瞥中国的传统乡土文化也剖析其中的许多缺陷。他一方面出于对中国文化现代化的追求,看到了乡村文化转向城市文化的无可挽留以及乡村文化相对于城市文化的落后愚昧;另一方面出于对中国文化现代性的质疑,指出城市文化在现代化大旗掩护下所流淌的堕落与变异以及乡村文化相对于城市文化的和谐与淳朴。因此,沈从文是同时看到了乡村文化与城市文化各自的正面价值及负面效应,在两相对照中,他企图以乡村文化之优来补城市文化之弊,同时以城市文化之优来补乡村文化之弊,在经历了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化的双重失望以后,他开始以“爱与美”为文化建构的立足点,企图重构一种超越传统乡村文化与现代城市文化的理想的完美的中国文化。所以,沈从文的文化反思是对整个中华民族的现实生存与现代文化在根本上的一种整体反思,而并不是单纯地对于城市与乡村的局部反思。

然而,本文在梳理沈从文创作文本研究历史与现状的基础上,所致力并不仅仅在于对某种误读的反驳,同时更重要更集中精力的应该是在梳理过程中的重新发现与全新解读。这就是,从怨恨的体验这个新视角,重新解读出沈从文创作之中的文化反思<sup>①</sup>的现代性体验的问题。

## 二、沈从文对传统文化的反抗

许多人只是关注沈从文对传统文化特别是对乡村文化的偏爱,强调或者干脆认为:沈从文的文化选择就在于他对传统乡村文化价值的向往与肯定。这种观点曾经很长时间被许多人接受或认可。其实,笔者认为,诚然,沈从文是发现了现代化带来了许多不可预料的灾难,是表达出对现代性之悖论性的极大怨恨,是表现出对于传统乡野文化的明显向往与回归——但是,问题的复杂性恰恰就在于,沈从文并没有因此而失去了对传统乡野文化的反思与批判。

笔者认为,沈从文的伟大就在于他既因现代性的悖论性而反抗与怨恨现代,同

---

<sup>①</sup> 关于文化反思,请参阅:王明科:《中国文化现代化与现代性研究中的五大弊病》,《河北学刊》2005年第2期,又见《光明日报》2005年3月29日第8版、《新华文摘》2005年第11期第162页、《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5年第4期第190页的部分转载以及中国人民大学资料复印中心《文化研究》2005年第11期第52~58页的全文转载。

时他也因现代化的追求而反抗与怨恨着传统。<sup>①</sup>因此,反抗中的怨恨就成为中国现代作家沈从文的现代性体验之一。

“乡下人”沈从文虽未留学国外,但他通过中国城乡文化的对比,清楚地看到了现代化不可避免的趋势,以及在进化的意义上,工业文明相对于农业文明的巨大进步。他以现代化的高度文明成果作为参照,既从文化的物质层面对中国传统的社会制度结构作出了全面的反省,又从文化的精神层面对传统中国人落后的心理、性格、信仰、追求、习惯、风俗等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并表达出了对于中国传统种种弊端的极大反抗与强烈怨恨。

沈从文的怨恨观是一种建立在生命意义上的怨恨观,他将怨恨上升到了生命自觉的高度。为了更好地理解作家在小说文本里的怨恨体验,我们很有必要首先将作家在其散文与文论中的对于怨恨的直接性表达举例出来。

在《中国人的病》里,沈从文很尖锐地指出:

支配中国两千年来的儒家人生哲学,它的理论看起来是建立于“不私自”上面,话皆说得美丽而典雅。主要意思却注重在人民“尊帝王”“信天命”;故历来为君临天下帝王的法宝。前世帝王常利用它,新起帝王也利用它。然而这种哲学实在同“人性”容易发生冲突。表面上它仿佛很高尚,实际上它有问题,对人民不公平。它指明作人的许多“义务”,却不大提及他们的“权利”。一切义务仿佛都是必须的,权利则完全出于帝王以及天上神佛的恩惠。中国人读书,就在承认这个法则,接受这种观念。读书人虽很多,谁也就不敢那么想:“我如今作了多少事,应当得多少钱?”若当真有人那么想,这人纵不算叛逆,同疯子也只相差一间。再不然他就是“市侩”了。在一种“帝王神仙”“臣仆信士”对立的社会组织下,国民虽容易统治,同时就失去了他的创造性与独立性。平时看不出它的坏处,一到内忧外患逼来,国家政治组织不健全,空洞教训束缚不住人心时,国民道德便自然会堕落起来,亡国以前各人分途努力促成亡国的趋势,亡国以后又老老实实同作新朝的顺民。历史上作国民的既只有义务,以尽义务引起帝王鬼神注意,借此获取天禄与人爵。待到那个能够荣辱人类的偶像权威倒下,鬼神迷信又渐归消灭的今日,自我意识初次得到抬头的机会,“不知国家,只顾自己”,岂不是当然的结果?<sup>②</sup>

在《穷与愚》里,沈从文又很具体地指出:

穷和愚至今似乎尚成为绊住中国进步的两个活结。这活结且若出于

<sup>①</sup> 关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对于传统的反抗可以参阅:王明科:《论反传统》,《社会科学家》2005年第2期,第17~19页。王明科:《论鲁迅反传统思想的价值》,《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第56~59页。

<sup>②</sup> 沈从文:《沈从文文集》第12卷,花城出版社1984年版,第350页。



一条绳索，彼此牵缠。不论你在上在下，在朝在野，不论是“中国的主人”或“公仆”，凡欲向上挣扎，总不免让这个来自四面八方看不见摸不着的有历史性的活结套住，越缚越紧。这个抽象阻力，不仅来自敌人，自己的普遍而长期的怠工，萎靡不振，且更加强作用。伊若任何高尚理想与合理事实，都无从着手，无从生根。我们对日本算是打了个胜仗，把这个很自大的国家，用我们的长处也用我们的弱点紧紧拖住，从而崩毁了。但对我们自己这个有历史性的弱点挣扎时，直到如今，却真是一个惨败！<sup>①</sup>

从这些论断看来，沈从文的怨恨，真正是源于对生命本身的关怀与生存本身的体验。这恰恰正如沈从文在《断虹·引言》里所说的一样：“这正是一种……生命发展的过程。由幻念而接近事实，由枯寂而有所取予，又由习惯上的相差相左而形成爱憎。爱怨交缚，因之在似异实同情形下，燃烧了关系中每个人的心，带来各式各样的痛苦。痛苦的重叠孳乳、变质，即促进生命的逐渐崩溃……玉碎者反得宁息，瓦全者转不知何以自处……灵魂破碎，粘合无从……云散烟消……”<sup>②</sup>

正是由于这种“爱怨交缚”的生命观，使沈从文对传统文化的许多不合生命之弊端处，表现出了很大的怨恨。

#### （一）怨传统制度文化不合理，恨传统一切权威为敌人

如果我们从反抗这个视角来关注沈从文的创作特别是他的小说创作，那么我们会发现，沈从文反抗与怨恨的首先是中国传统的制度文化。

小说《入伍后》怨传统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恨其弄成的一切权威为敌人：“你当认清你生活周围的敌人：时时想打仗的军阀？不是的！穿红绿衣裳用颜料修饰眼睛的女人么？不是的！在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下，养成的一切权威，就是你的敌人！”<sup>③</sup>可以说，这是沈从文全部小说创作的一个提纲性的论断。在这里，作家宣布了他的怨恨是针对制度而非个人，因此，反映出的是，沈从文的反抗与怨恨，在很大程度上是已经超越了其本人个人性的一己情绪与自私欲望——当然，其间包藏有作家自己的怨恨情感体验，也是比较正常的，也是可以理解的。

小说《若墨医生》怨中国国家毫无目的的漂泊无归，恨掌舵坐船的人没有任何办法；怨中国缺少认真做事与思索的人，恨不仅坐船的不行而且驾船的也不行；怨坐船的没见过风浪，恨掌舵的又太年轻。若墨大夫的思考，也是从最根本的制度与体制方面的思考，他认为：“大家都以为存在的不会比那个不存在的好，及以为后一个应比前一个好，故对未来的抱了希望，对现在的却永远怀疑。其实错了的。革命在试验中，这失败并不是革命的失败，失败在稍前一辈负责的人。一个人得结核病还

① 沈从文：《沈从文文集》第12卷，花城出版社1984年版，第386页。

② 沈从文：《沈从文文集》第11卷，花城出版社1984年版，第60页。

③ 沈从文：《沈从文文集》第2卷，花城出版社1982年版，第17页。